

成中英:仁义之道无法摧毁,儒学的生命力依然存在

作为海外儒学研究代表人物的成中英,长年致力于在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哲学,每年多次往返于中美两地。

“在目前的社会处境中,无论儒家的理想价值能否获得指导与规范社会发展的地位,我们仍可深信儒学有其蕴藏深处的活力与源泉。”成中英一向认为,儒学的发展,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挖掘这块土地深处的灵泉。只有不断地把儒学的理论说清楚,把其理性原则与德性伦理的理想价值列举出来,儒学才能把历史文本的沉默转化为现代话语的说服力,再转化为现实的实践力。

多年来,这位曾经希望成为散文诗人的哲学家,一直辛苦奔波,孜孜不倦,为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知,做着不懈的努力。

1

中华读书报:家庭背景和孩提时代的环境,对人的性格和兴趣的形成有无形的影响力。您走上哲学研究之路,有怎样的缘起?

成中英:我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成惕轩先生从小就在祖父炳南公的鼓励下精读古书并治学。我从小喜欢看天文地理,喜欢神话故事,小学四年级就看了《封神榜》《西游记》《三侠五义》等,我也不知道是喜欢听故事引起我的好奇心,还是因好奇心而特别喜欢听故事,也许这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使我养成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喜欢追求真实是什么。我喜欢文学,继而又由喜爱文学而走向喜爱哲学,总是追问“是什么”“为什么”,这也许是一个人的理性发展的自然线索吧!

1946年,父亲鼓励我写一篇自重庆到南京的旅行游记,我写完投到《中央日报》的“儿童周刊”,竟然发表了。在南京读书的两年,我开始接触西方翻译小说,如大仲马的《侠隐记》、但丁的《神曲》、纪德的《地粮》,凡是有启发、有生命力的,具有开展性的文学我都喜欢。这使我对西方文学怀有很大兴趣,并导致我以后对文学创作总是跃跃欲试。高中时代,我热衷的求知对象一是天文、物理,二是西方翻译文学。1949年我们自成都到台湾。我接触到张灏的《天文学》,看了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书,看得最多的文学作品是五四时期作家翻译的俄国、法国作品,其中雨果和屠格涅夫给我的启示最多。我还读唐棣的《落帆集》,对下之琳、戴克家等诗人也很着迷,那时我还想做一散文诗人,在《新生报》上发表过散文《小石》《电线杆》《红叶》,也写了两个短篇小说,为自己取笔名“好山”,因为那时我已知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我更偏重仁者。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后来选择了哲学?

成中英:我考取了台大外文系,方东美先生讲授“哲学概论”,成为我踏入哲学的门槛。我曾经把听方师课的笔记背得滚瓜烂熟,又到图书馆内尽情阅读各种方师提到的哲学著作,包括他早期的《科学哲学与人生》。大学二年级,我已经下定决心研究哲学了。

2

中华读书报:您在1956年赴美留学,从西方哲学的灵魂深处传播、肯定中国哲学,这种使命感来自哪里?

成中英:出国之前,父亲送我《五经集传》,怕我入西学迷不知返。其实,我心中早有志向追求西方学术和哲学,以反哺中国传统,使其立足于世界,这不仅是民族文化感情的作用,也是经过理智反省后的志向。我先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就读,又进入哈佛大学哲学系,我的哲学生命受到了西方哲学最严格的陶冶和锻炼,使我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感到其心脏的脉动,而且也使我深深体会到哲学既不同于文史,也不同于科学,却与这两者不类不杂,有其严肃的理智性格。我当时觉得,我可以奉献于中国哲学的就是这一颗哲学的赤子之心。

中华读书报:具备了开阔的学术视野之



后,您对中国哲学是怎样的态度?中西哲学的打通面临怎样的难题?

成中英:我一点也未曾忘怀中国哲学。我的哲学生命在生长中,除了吸取西方哲学的精华外,也努力在为“中国哲学”“培风”(庄子语)。我一直利用时间发掘中国哲学的问题。中西哲学有其结构上的不同,西学犹如结晶玉石,中学犹如行云流水,两者如何才能融成一片,正是我哲学生命和哲学生涯的重要课题,也是我锲而不舍的追求所在。

中华读书报:研究儒学,您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

成中英:哲学的知识和儒学的智慧最重要的,是我如何与世相处、与人相处、与自己相处的源头活水。我的儒学研究,大概可以归纳为:一是理解的阶段,从小长大注意到中国人的历史遭遇,并从经典中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二是治学的阶段,能看到知识及其系统的重要性,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文化知识有自觉的追求,也认识到西方在这方面的历史成就;三是愿景的阶段,我从生命中发现了生命本身的价值,发而为对宇宙生命的一种感受与关怀,进而认识到中国文化传统从易学到儒道的一贯价值性、包容性、世界性。我接触到的家庭和社会是温暖和有爱心的,中国文化就是爱心文化、关怀文化,人和人之间彼此关怀、彼此依存、彼此同行。民族的灾难下,产生爱国心理是自然的。

我在自己的追求过程中,对中国文化创造力的根源非常关注,对中国历史出现的卫国爱民的圣贤与民族英雄非常敬仰;一方面对于求知有强烈的兴趣,一方面力图创造性的思考,觉得人类作为一个不灭的生物体,必须认同宇宙持续不断的创造力,把理解世界看成自我的一个责任。我深信理解世界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这是我逐渐形成的一个坚定的心态。

3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儒学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支撑儒学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什么?

成中英:儒学发展,先后经历了先秦、两汉、宋明儒家、清代以及当代新儒家。在隋唐时期,由于受外来文化影响,儒学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受到了一种遮蔽。儒学是开放的体系,把外在的宗教作为成长的资源,才产生了宋代的宋明理学。那么后来的儒学是否在衰退?不是,它的主体还在,而且产生了更完整的体系,这是一种成就,但不是最后的成就,也不是永久的模式。清代儒学的研究形态,基本沉在故纸堆,对世界的张力呈现一种自我保守的状态,这种心理上的封闭,是闭关政策造成中国和外界脱节,造成文化往回看不能前看的自满状态。

我强调哲学是儒学活力的来源。哲学是超越的,如果不能用哲学意识认识历史,历史就成为一堆烂账。所以要跳出,考察人性的意义,追求善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儒学在清代的发展,从历史来看是闭塞的,造成儒学整体开始往下走。明末西学东来,并非通过自觉的交流,而是通过基督教传教士的说教,没有对应的理解,没有知己知彼,中国文化沦为西方侵蚀中国的工具,而非文化沟通的管道。列强的侵略战争,把中国推向历史悲惨的境地。

儒学发展经历的转折点之一,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化运动中,进一步否定儒学的价值,儒学的整体性丧失掉了。历史的消解,西方文化的冲击,再到自我的内在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产生了对儒学的全面否定,连根都要挖掉。

中华读书报:这时候的儒学呈现怎样的状态?儒学的恢复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

成中英:儒学的生命力依然存在,幸好

成中英,著名哲学家,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1935年11月8日生于南京,196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专研易经哲学、儒家哲学、比较哲学、逻辑、形而上学与知识论、诠释学,现任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主要著作逾35种,包含《中西哲学精神》《C理论:易经管理哲学》《易学本体论》《成中英文集》四卷本《成中英文集》十卷本、《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知识与价值》《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发微》等。

网上文谈



栏目主持/采写:舒晋瑜

保存了一份历史的记忆,并没有说因此就消失。事实上,无论近代历史如何自然消解,儒学作为一种生命的体验或人类生命的一种本体的学问,跟人的存在和对存在的完善性是连在一起的。这是个最原始的文化记忆,也是本体学的体现。历史是无法取消的,外在在合理的形式仍有其内在的魅力,即使自我批判也不能全然抹杀。这是文化生命的肯定。

文化的恢复,要求人能够理解自己,关怀他人,从关怀他人到理解自己,从理解自己到关怀他人,仁义之道是与生俱来、无法摧毁的。儒学的种子野火烧不尽,春风又吹又生,让中国建立现代国家基本的要素充实起来,这时就要问内在的活力是什么,生命力在何处,这就要从民族精神、文化精神上追溯,所以儒学重新受到尊重和重视,不单纯是政治的、经济的原因,也是基于全球化的动力,因为历史在全球化这个阶段,都需要掌握自己的文化,要肯定自己存在的意义。在这种要求下,儒学的精神就能很好地恢复。这种恢复,要回顾人类历史,面对整个世界,并必然走向儒学精神的再认识和再肯定。

一路走来,中国经过了多少历史沧桑,儒学不管是作为民族文化的生命还是文化存在的方式,都要有一个说明,这个说明启发我们对未来应该有怎样的建言和创造。回顾才能改良,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

4

中华读书报:作为“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您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开始研究儒学的?

成中英:西方的成果怎样为我所用,避免西方犯的错误,包括自私与霸权的错误,怎样才能体现未来人类社会的理想,实现中国儒家所谓“天下为大”的大同理想,这是新儒学发展的动力。

我看到这个动力。第三代新儒家是自然形成的。身处历史潮流中才能够有这样的反思和深思。我个人出生在抗日战争的前夕,经历了艰苦的抗战,经历了今天中国的繁荣、稳定和在世界上的兴起,我自己注意到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个意义有深厚的根源,有一个凤凰浴火的再生的过程,就是锲而不舍追求维护人的价值或理想的存在,这就是中国近代发展的道德含义。

中华读书报:中华文化在与世界文化融合中,最重要的方面有哪些?

成中英:科学和人文整合起来。西方是科学知识的体系,中国是人文价值的体系。科学和人文不是冲突的,西方和中国传统中的价值不必非冲突不可。我们过去较少考虑到的是宗教问题。我三四年前在香港做了《儒家的精神性》的演讲,谈到儒家作为终极信仰的可能性。信仰不一定是宗教,更不必依赖外在超越,因为它也可以来自对生命的反思。由于这种精神性的建立,我关注的都是在21世纪发生的事件。我的英文著作里谈到宗教意识,也谈到基督教和儒教对话,我是最早在夏威夷大学提出这种对话的。我谈到儒家的存在性,把现实和理想结合在一起,把外在知识和内在意志结合在一起,在这种认识中可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我可以知道我生命本体发展的方向与归宿,知道道德自由,也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儒学在当下有怎

样的现实作用?

成中英:儒学在当下能起到什么现实作用,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我认为儒学作为一个主体,当即之务,应是把下一代教育好,匡正社会风气,强化现实的公共行政或政策的考虑的基础。如果是君子,有知识,世界因此大治,国家因此更好,何乐不为?学而优则仕,仁政是有道理的,不做官,就不考虑儒学了吗?这也是一个问题。文化是动态的,在今天中西文化广泛的交流对话中,新的文化也将在未来发生作用,甚至改变中西文化的气质。因此,西方文化需要中国文化改变它的气质,同时中国文化也需要西方文化激发其潜力。

中华读书报:中国哲学如何走向世界,您持什么观点?

成中英:首先,我们认识中国哲学的真相之后,会发现中国哲学本身就处于世界的舞台。问题在于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哲学被隐藏在现实历史之中。要发展中国哲学,就要强化自我认知,掌握中国哲学的精髓和源头活水,掌握中国哲学本身的意义,发挥生命的力量,追求对宇宙生命的体验,达到人我共通,消除各种纷争,建立和谐社会。其次,要了解西方为什么能建立哲学,才能对症下药,化西方问题于中国哲学之中。西方哲学强调逻辑、强调科学,已经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已经“基墨尘上”,好的地方我们要承认、学习,也要指出他们的问题,把西方哲学纳入更大的系统。所谓“智周万物,道济天下”,我最大的愿望是以哲学实现自我生命、实现最后的和平繁荣,这就是后来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实际的做法就是对话。我创办《英文哲学季刊》期刊已经五十多年了,尽量帮助西方哲学家了解中国哲学,认识哲学问题解决的基本方向,而不局限在西方的死胡同里。西方是二元主义,机械性的;中国哲学是一元主义,动态性的;一元可以包含二元。另外要广结善缘,光说走向世界是空洞的,要有心愿并且长期地推动。我希望在和西方对话中加强对中国哲学的充实和健全,这个过程不只是走向世界,是自我发展同时帮助别人发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仁爱精神的推广。

中华读书报:重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关系,是您近几年重点关注的,您提出中国哲学的重建和再发展过程,都是以回到自然宇宙观为开始点的。能否简单阐释一下?

成中英:我们讲中国文化复兴讲得多,很少讲中国哲学的复兴。我在很早前提到一个命题,中国文化的复兴必须要以中国哲学的复兴作为根基和主导。哲学是文化的精华,文化是哲学的实现。文化中有许多优良,也有一些缺陷,需要以哲学的冷静进行全面思考。中华文化复兴首先要加强反思的能力,要有认知的精神,有理性的哲学思考,经济越发展,国家越发展,越需要哲学。孔子为什么成为伟大的哲学家?孔子提出仁、义、礼、智、信,这需要哲学的精神,哲学的自觉。“哲学”这个概念是西方传来的,其实中国自古就有哲学,中国是哲学的民族。我们最根本的追求就是,让中国人作为生命体,作为一个民族活得更健康更快乐更智慧。

海外短视频网站成为图书销售的重要推手

(上接第17版)2016年,她在面簿设立小组,供其追随者互相交流,其成员已逾11.8万人。在图片社交媒体因斯塔格拉姆上,她同样表现活跃。

胡佛有经营社交媒体的天赋和个性,有时会自嘲的、亲民的方式录制滴答视频。在一条短视频中,她开玩笑地说自己“被高估了”。这条视频获得了320万的观看量。

在滴答上走红的书以小说为主,而且往往出版于几年前。这在出版界并不常见。以往一本书不能畅销,通常一上市就能看出版。

作家马德琳·米勒(Madeline Miller)今年43岁,早先从布朗大学获得了古典文学硕士学位,2011年出版小说《阿喀琉斯之歌》(The Song of Achilles),描写强健俊美的少年英雄阿喀琉斯和流亡王子帕特罗克洛斯之间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首印数仅为两万本,但今年7

月,出版商埃科社宣布其销量已达200万册。

新冠疫情开始以后,米勒失去了到各地演讲和签售的机会,一度产生重操旧业、回去当高中老师的念头。不仅如此,自2020年2月以来,她还一直在与新冠后遗症作斗争,并担心自己再也无力写作。幸运的是,滴答让《阿喀琉斯之歌》成了畅销书,也一并带火了她的2018年出版的第二本小说《喀耳刻》(Circe),使她得以养家,并继续创作下一部小说。

“它当真改变了我的生命。”米勒告诉哈里斯,“它让我有了写作的时间,继续当作家。”

5

在爆款滴答小说中,虽然也有《呼啸山庄》和《了不起的盖茨

比》等经典作品,但最受推崇的类型仍然是言情、科幻和奇幻,以及所谓的“伤心女孩”。

科琳·胡佛笔下传统的苦恋与新潮的“伤心女孩”并不相同。“伤心女孩”或“失常女孩”似乎更为“高端”,其代表是爱尔兰小说家鲁尼或美国小说家莫什费格笔下的主人公。英国时尚杂志《恍惚》(Dazed)今年早些时候刊登作家埃玛·加兰(Emma Garland)的文章,用“解离型女权主义”(Dissociative Feminism)形容滴答上众多的当代“时髦”女青年:

我们都记得她,身处“邈邈妹时代”的女人。我们知道她常常带着前晚的妆去上班,抽两根香烟当早餐,或是经历“女性冲动”,与她姐姐的男友上床。我们到处看到她的身影,从弗吉尼亚·伍尔夫《远航》里无

精打采的蕾切尔,到奥泰萨·莫什费格《我的休息和放松之年》(My Year of Rest and Relaxation)里心不在焉的叙事者。我们知道,她把自己的痛苦当成一种艺术形式来表演;某种本来可以控制的外在的东西,她却不顾一切地陶醉其中。这女人一团糟,对自己和他人都是威胁,是自我膨胀的危险信号,宁愿去死也不愿直接诉诸情感的交流——她是过去几年里兴起的一种女权主义新流派的代表。

“解离型女权主义”一词由作家埃琳·克莱因(Emmeline Clein)发明于2019年,用以形容滴答上某些年轻的妇女受到小说启发而力主采用的一种生存状态。更早以前,它有时也叫做“虚无主义”或“表演型虚无主义”,指妇女的意识脱离了直接的身体和情感体验,

像创伤反应一样与世界脱节。

作家索菲娅·佩泽(Sophia Peyser)今年1月为《锂杂志》(Lithium Magazine)撰文,题目是《解离型女权主义的邈邈妹时代必须结束》。她在文中指出,在典型的解离型滴答视频中,妇女表达的愿望是沉浸于悲伤,让伤害性的情侣关系继续,大幅改变自己的外表以重获美貌,或把男人的欲望放到自己的欲望之前——这一切都关乎妇女不再反抗,并屈从于自身的痛苦,从而浪漫化了异性恋妇女的绝望和自我毁灭的行动,并为痛苦吞噬的小说找到借口。在萨莉·鲁尼的小说《正常人》和《与朋友的谈话》里,女主人公均体现出此种倾向。这两本书在滴答上颇受追捧,也为害甚广,因为只有富裕的白人美女才能像鲁尼的主人公那样在都柏林四处游荡并大搞外遇,或是像莫什费

格的主人公那样放下自己的生活,睡上整整一年。

老一辈女权主义者鄙视今天的解离型女权主义者,但作家和妇女时尚杂志《涤纶》(Polyester)的主编约内·甘布尔(Ione Gamble)说,解离型女权主义者往往“有点凌乱和缺乏上进,对任何事情都不屑一顾,对世界非常沮丧,对自己的未来也无力于衷。但同时反过来看,她们也非常清楚自己的情绪”,因此仍然是“酷女孩”。

甘布尔认为,她们同样是女权主义者,但和老一辈的、斗士型或女强人型的女权主义者不同的是,她们是在互联网上长大的。新一代妇女通过解离或放纵内心深处的小丑,来对抗当今世界的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无尽的政治动荡,但问题是,走到这一步,她们也就没有什么别的路可以走得通了。